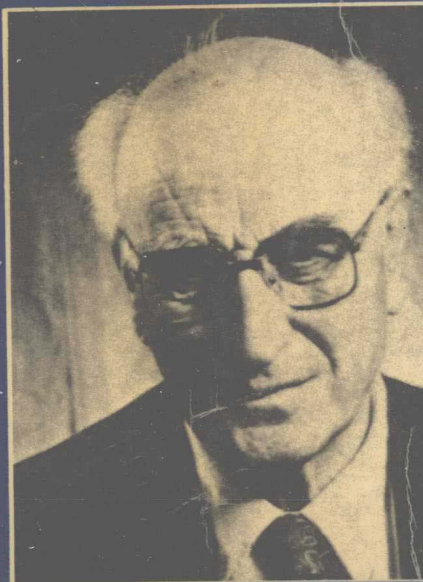




[英] 彼得·赖特 著

*Spy
Catcher*



抓间谍者

● 张禹九 王迈迈 刘华恩 杨希平 译 ● 郑克司 校

● 长江文艺出版社

抓间谍者

〔英〕彼得·赖特 著

张禹九
王迈迈
刘华恩
杨希平
郑克司

译

校

Peter Wright
SPY CATCHER

根据 American Viking Penguin Inc. 1987年版译出

抓间谍者

〔英〕彼得·赖特著

张禹九 王迈迈 刘华恩 杨希平 译

郑克司 校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5.75印张 2插图 336 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105—8/K·4

统一书号：11107·3 定价：3.30元

印数：1—80 000

内 容 提 要

这是最近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轰动的一部著名英国间谍的回忆录。

作者彼得·赖特在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工作长达数十年，参与和领导了间谍窃密、间谍工具研制等大量活动。书中真实地记述了英美情报机关如何联合窃取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高级情报，如何对世界多国情报机关进行渗透，对英共如何分化和瓦解，而情报机关内又如何互相争夺和互相利用等等。并对英国情报机关内部设置和分工一一作了详细交代。

全书可读性强，内容真实，能使我们了解到大量西方谍报活动的秘闻，对我们研究西方世界谍报机构的现状颇有参考价值。

序 幕

多年来，一直不知道我会是怎样的结局。直到1976年1月，我在英国安全机构——军事情报五处——的最高指挥机构干了20年之后，才重返现实的世界。

我最后一次走出尤斯顿路的地铁站，经过高厄街向特拉法尔加广场走去，冬天的太阳十分灿烂，走了50码便拐到了一座匿名机关大楼，大门处没有任何标记，它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家医院中间。这就是英国反间谍总部。看上去真有些不象。

我向小心谨慎地站在接待小室里的警卫出示了通行证，然后走进载送高级官员到六楼秘密内室的专用电梯。我在走道上悄悄地向处长室隔壁我的房间走去。

各个办公室都很安静。只听见下面远处地下铁道车的轰轰声，正把使用月票的乘客送往伦敦西区。我开了我房间的门锁。我面前摆着情报人员所必需的各种用具——一张办公桌，两部电话，其中一部是外线的，旁边是一个绿色的金属大保险箱，保险箱正面装有一个大号暗码锁。我将上衣挂好，

便不加思索地处理事务。在鸡尾酒会上以打听零碎新闻和流言蜚语混日子的退休官员，我见得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要彻底摆脱这种状况。我决定远去澳大利亚饲养马匹，另行谋生。

我拨动锁上的针盘，将笨重的保险箱门转开。箱内的前面是一大堆标明“绝密”的记录档案，在其后面是整整齐齐一排小暗码盒。这都是档案，多年来我整理了数千件，现在的这些是最近的。有按例行公事传到我这里的例行间谍报告，有计算机工作组的最新报告，有对爱尔兰共和军临时编制的最新分析。对档案总是要作出答复的。我可是无可奉告了。那位俄国外交官的档案是由一名年轻官员送到我这里来的。我还认得出他吗？未必。这是一件双重间谍案，时办时停，历时多年。我有什么打算吗？未必。当你参加这个工作时，件件案子都显得各不相同；当你离开时，它们似乎都一模一样了。我在档案上一一仔细地签上自己的姓名的字首字母，整理好，以便叫我的秘书送到档案室去。

午饭后，我着手清理暗码盒，把它们一盒一盒地从保险箱的后部抽出来。第一盒里面是有关窃听器和无线电接收器的技术详图——我在50年代任五处最早的科学官员时的残存之物。我将目次整理好，以便交给技术科。过了一个钟头，技术科科长前来向我致谢。他是个非常时兴的替政府工作的科学家：整洁、谨慎、一味捞钱。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我说，“对你没有多大的用处。现在全都用人造卫星了吗？”

“哪里。”他回答说，“我会喜欢看的。”他显得有点窘。他和我从来就不意气相投。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地。在战争期

间，我干此工作，凡事将就凑合，有什么可用就用什么；而他用的全部是新式的贵重仪器设备。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又去整理我的保险箱。

其余几个盒子里装的是我在1964年到反间谍科工作之后才收集的文件，当时在英国情报部门内部搜查间谍的活动正密锣紧鼓。手写的笔记和打字机打的备忘录里记的全是广为流传的间谍活动事件——被怀疑者的名单和告发的详细记载，告密、判断。这种无休无止的追踪纸屑的游戏，在开始时非常易于分辨，但到最后却神秘莫测了。这便构成了我的职业的脉络。

“您的日记。”我的秘书终于进来，边说边递给我两本蓝皮书。我和她一起将蓝皮书撕碎，扔进我办公桌旁边的烧袋，直等到举行告别会之时。

我向编制科走去。值日官递给我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一份我的日常秘密训导清单。我开始在几张收条上签字。首先签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部分，然后仔细查看我保留的全部案件训导材料。获得机密全然是自己的事，但交出机密却要官事官办了。手里的笔每挥一下，门便关得紧一分。不到半个钟头，这个多年来撑持我的秘密世界便永远将大门关闭了。

近傍晚时分，我坐出租汽车去五处原来的总部，设在五月墟市的利康菲尔德大楼。机关正在搬迁，新址在柯森街一幢大楼的顶层；不过职工酒吧——也就是“千杯少”俱乐部——仍在利康菲尔德大楼里，为我安排的饯行会就在俱乐部里举行。

我走进这幢旧楼。搜查菲尔比、伯格斯、麦克林以及布伦特等人，就是在这楼里镶着柚木的走廊上和墙上装饰着花

檐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打进我处的要害部门，神不知鬼不觉，以致引起猜疑纷纷，我们五处为此进行的一场极其秘密的战争，也是在这里。我们怀疑是五处前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但又拿不出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此愤慨之极，双方犹如中世纪的神学家，为本能、感性和偏见所驱使而不共戴天，为时长达10年之久。

到70年代，这几位主角一一退休，最后搬迁新址总算表明，此战告终。我走在利康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时，背叛、追踪、所追踪的对象的蛛丝马迹均历历在目，如同就在昨天。

为我开的饯行会十分简单。大家谈些高兴的事。处长迈克尔·汉利爵士发表了恰如其分的讲话。我收下大家按惯例送给我的名片，上面有各位的手笔，写的临别赠言。五处的大密探克兰莫里斯勋爵的赠言说我的离开是“可悲而又可叹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的意思是指对单位而言。但是真正的损失却是我本人的损失。

当晚，我就睡在高厄街办公楼顶层的一套房间里，到达尤斯顿站的火车的嘈杂声不时把我吵醒。第二天清晨，我穿好衣服，拎起破天荒第一次是空空如也的公文皮包，下楼向大门走去。我向警卫说声“再见”便走出大门到了街上。我的职业结束了。可悲而又可叹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啊。

一切是从1949年开始的，那春日的一天使你想起冬天来。雨水打在埃塞克斯的格雷特巴多那用预制构件盖的实验室的白铁屋顶上。我作为海军部的科学家被派到马可尼公司在此工作。示波器象一件令人头痛的东西在我眼前颤动。搁板桌上放着大堆匆匆记下的数据。要设计出一种雷达系统，能够探测到无边无际的滚滚浪涛中的潜艇上的潜望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试验了多年。电话响了。是我父亲莫利斯·赖特打来的。他是马可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迪·布伦德莱特要见我们。”他说。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莱特当过皇家海军科学处处长，现任国防部主任科学家。他本人近来对我的计划的进展产生了兴趣。是否提供资金生产一种试制型系统，急待作出决定。该项目耗资很大，战后的防务研究面对财政缩减，要进行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才行。我已准备好再碰一鼻子灰。

我高兴能有直接同布伦德莱特交谈的这次机会。他是我们家的世交；我父亲和我在战争期间都在海军部研究所为他工作过。我想，说不定有机会找个新差事的。

第二天，我们在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中开车去伦敦，将

车停在斯托利盖特的布伦德莱特的办公处附近。白厅显得阴沉而破旧；柱廊的雕像同这迅速变化的世界似乎很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①还在作“威力与乐观”的指望，可是寒冬难熬，人们靠定量配给已是坐卧不宁了。1945年的胜利所带来的幸福感早已为忧郁的愤慨所代替。

我们向布伦德莱特的的外室里那位衣着整洁的秘书通报了姓名。这个附属建筑物里冷冷清清，跟白厅一样。我们并不是最先到达的。我向几个熟人致意：来自各个处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依我看，众人来此倒象是参加一次例行会议。有两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单独在一起，远离众人。

“你们两位一定是赖特父子啦。”这两个人当中个子较矮的那个人突然说。他说话简略，一口部队腔。“我是陆军部的马尔科姆·柯明上校，这是我的同事休·温特博恩。”另一个不认识的人走了过来，“这位是约翰·亨利，我的朋友，外交部的。”柯明以白厅惯用的那种奇特方式来区别对待白厅的特工人员。不论这个会是谈什么问题，我料想都不可能涉及反潜艇战；五处和六处派代表到会，就不会谈反潜艇战问题。布伦德莱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请我们进去。

他的办公室跟他的名气一样，非常大。大吊窗和高悬的天花板完全使他的办公桌相形见绌。他带领我们走到会议桌旁，吸墨用具和细颈圆酒瓶早已一溜摆在桌上，想得可谓周到。布伦德莱特个子很小，但精力充沛，是那支精选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里还有林德曼、梯扎德和考克洛夫特，负责使英国能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提出的技术与科学上的需

① 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从1935年到1955年任工党领袖，从1945年到1951年任首相。

要。他曾任海军部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后来又当皇家海军科学处副处长。战争期间主要是负责把科学家吸收到政府部门工作。他作为科学家，才华并不出众，但他懂得科学家能起的重大作用。他的政策就是尽可能提拔年轻人，加上部门的首长们信任他，所以他能获得必要的物力，使其最充分地发挥作用。

40年代后期，当疲惫和力量大衰的英国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冷战——的时候，能再一次最充分地激励科学机构提出建议的人，显然就是布伦德莱特了。他被任命为国防大臣的副科学顾问，并在1954年继约翰·考克洛夫特爵士之后担任国防研究策略委员会的科学顾问兼主席。

“各位，”我们就座后，布伦德莱特开口了，“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去年在柏林发生事件以来，我们就处在战争中了。”

布伦德莱特解释说，俄国对柏林的封锁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空中补给线，对防务见解的冲击很大。

“打这场战争，是用间谍而不是用士兵，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他接着说，“我已同安全处处长珀西·西利托爵士讨论过我们的处境；老实说吧，”他断定地说，“情况不妙。”

布伦德莱特干脆把问题摊开。在铁幕后面成功地指挥特工人员已经完全不可能，有关苏联及其盟国的意图的情报又奇缺。需要以技术与科学方面的主动来弥补这一缺陷。

“我已同在座的几位大致讨论过这个问题，柯明上校是安全处的，彼特·狄克森代表六处，我已组成这个委员会，作出抉择，并立即着手工作。我已建议珀西爵士取得一位青年科学家在研究工作方面的协助。我想提出彼特·赖特这个

名字，你们当中也许有人认识他。他现在是部队电子学研究室的人，在我确定工作量的多少之前，他将在我们这里兼职。”

布伦德莱特在桌子对面望着我：“彼得，你会替我们干的，是吧？”

我还没有回答他，他又对我父亲说：“我们显然也需要马可尼，也就是 G. M. 的帮助，所以我也增选你为本委员会成员。”（马可尼在从前以“G. M.”这一称呼而知名，我父亲在海军里也往往以此称呼而知名。）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莱特式的做法，发请帖犹如下命令，使白厅机构全然走样而就范，按他的意思办。

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讨论了种种计划。五处和六处的代表显然是一言不发，我料想，会上有外人，特工人员沉默不语是很自然的事。

每位科学家将各自实验室进行的可能应用于情报方面的研究工作，都临时作了大致的介绍。对情报工作的需求，作详尽的技术审查，显然要花时间；但他们急需不必进入屋内就能进行窃听的新技术则是明显不过的。苏联的保安工作严密得连针都插不进去，因此不利用界墙或重建的大使馆，而要得其门而入，那简直不可能。到了吃茶点的时候，我们已拟出20个在某些方面可能取得研究成果的方案。布伦德莱特指示我整理一份评估各方案的记录，会议就此结束。

当我正要离开，有个人前来自我介绍。他是邮政局技术部的约翰·泰勒，刚才在会上相当详尽地谈过邮政局在窃听装置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一起搞这项研究。”他说。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我下星期联系。”

开车回格雷特巴多的路上，父亲和我谈起刚才的会议，都十分兴奋。完全没有预料到，真了不起。白厅在战争期间是经常这么干的，但是自那以后就很少这么干了。摆脱反潜艇工作的机会来了，使我心情激动；他呢，是因为45年来贯穿于我们家的这根秘密情报的命脉又得以延续下去。

2

1912年，我父亲大学毕业后进马可尼公司当工程师，开始研究一种新方法来检定无线电信号。他同 H·J·朗德上尉一起研制一种真空接收器获得成功，首次使远距离通讯侦听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两天前，他在切姆斯福的霍尔街那间破旧的马可尼实验室里研究接收器，才意识到是收集德国的海军通讯。他将第一批资料交给马可尼公司经理安德鲁·格雷。格雷跟海军参谋部情报处处长瑞治·霍尔个人相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部门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负责德国密码的破译工作，地点就在闻名的海军部40号室里。他安排我父亲上了一部特许的火车头前往利物浦的大街车站。他细阅资料之后便要马可尼公司放我父亲，去为海军建立侦听站和定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军参谋部情报处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及时探知德国公海舰队离港出航，使以斯卡帕弗洛^①为基地的英国舰队能进行截击。海参情报处知道，德

① 英国海军基地，位于苏格兰北部水域。

国舰队不出海时是停泊在基尔运河东端水域。霍尔认为，旗舰上的德国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要通过基尔运河而发往北海，要探测到它也许是可能的。

我父亲着手设计灵敏度极高的设备，终于研究出“非周期性”定向，能在大量干扰信号中非常精密准确地确定所需信号的方位。正式使用尚需几年时间，不过最后毕竟成了反潜艇战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即便在如今，所有的定向设备都是“非周期性”的。

1915年，这种设备尚未全面使用，我父亲向霍尔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克里斯提安尼亚（如今的奥斯陆）设立定向站。当时挪威是中立国，但不能使用英国大使馆，以免引起德国人警戒；于是，霍尔问我父亲是否愿意前去秘密地为六处办定向站。没过几天，他就上路去了挪威，伪装成跑农药生意的推销员。他在克里斯提安尼亚一条僻静街道的小客栈里，租了一个亭子间，位置很高，可以安放定向无线电而不会引人注意。

大使馆的六处工作站供给他通讯系统和备件，但风险极大。他那台无线电设备最终必然使他败露。他不属外交人员，一旦暴露便无人承认。在这战争还在继续之际他能进俘虏营就是万幸；若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那就凶多吉少了。

此工作开展半年，十分成功，及早向海军部发出了有关德国舰队动向的非常宝贵的警报。一天上午，他下楼到他经常用餐的桌旁吃早餐无意中朝街对面望去，发现对面墙上有一张刚贴的布告；上面印着他的照片和通缉他的悬赏。

在此工作开始之前，他已同六处拟定了逃跑路线。他匆匆吃完早餐，回到房间，小心翼翼地将无线电设备装进箱

子，推到床底下。他收拾旅行证件、护照以及海军部身份证，留下一大笔现款，指望此款能使客栈老板高兴得将他忘得一干二净。

挪威当局料想他多半会由瑞典海岸逃跑，但他却没有走这条路而向西南方向逃走。走了10英里到了海岸，他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过了一会，一名英国海军上尉走到他跟前，问他是何人。父亲说明自己的身份之后便被带去吃了午饭，又用船将他送上等在那里的一艘英国驱逐舰。

数年之后，我想在六处档案里找一找这次行动的详细记载。我同当时的六处处长莫利斯·欧德菲尔德爵士相约，花上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档案室里找找这些文件，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六处废物处理人员在几年前已将这些记录销毁了。

我于1916年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家里。我父亲去挪威替六处工作期间，我母亲便搬到我祖母家去住了。那天夜晚，“齐柏林”飞机^①空袭谢菲尔德附近一带，我母亲早产生下了我。因为在打仗，家里没有医用升降床，我母亲只好以玻璃药瓶和热水袋当作临时的保育箱来维持我这条小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父亲又进马可尼公司，成了马可尼本人的属下，当了研究所所长。我们搬到了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但为时仅数月，便又迁往切姆斯福郊区的住处。这座房子很象一家已被废弃的无线电厂。各个角落里都藏着失修情况各不同的收音机和装满电路图的马口铁箱。我父亲很认真，易动感情，性子急——倒象个艺术家

① 德国人齐柏林发明的一种“硬式”飞机。

而不象工程师。早在我能记事的时候，他常带我去花园或去埃塞克斯海滩高处的旷野，把无线电的奥秘讲给我听。他讲解什么是电子管和晶体管，告诉我转动收音机的针盘时要细心，那乱糟糟的静电波便顿时变成了清晰的信号，一讲就是几个钟头。他教我怎样自己动手做实验；当我向阿瑟·艾丁顿爵士和 J·J·汤姆森等到我们家来的客人表演我这粗浅的技能时，他那得意自豪的表情我至今仍然记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六处同马可尼公司的关系密切，我父亲跟它们仍有联系。马可尼公司有一庞大的海事科，负责给船只提供和安装无线电。这个科替六处打掩护是再理想不过了。六处准备同我父亲一起将六处的一名官员作为无线电报务员安插在一条船上，因为六处对此船驶往的地区极感兴趣。

霍尔海军上将常来这里。他一来便和我父亲消失在花房里了，一呆就是几个钟头，密谈某些新进展。我父亲也认识六处的首任处长曼斯菲尔·柯明上尉。他非常钦佩柯明，因为柯明既有胆识又精通技术。我父亲对五处的创办人弗农·凯尔上尉虽然不很了解却不喜欢此人。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人们往往不是倾向于五处就是倾向于六处，而我父亲很明确，完全支持六处。

对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马可尼公司是世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之一。以缩写“G. M.”而闻名的马可尼是杰出的识才之士，又有知人善任的魄力。他的最大成功就是制造出了第一台短波无线电射束装置；他完全有理由声称为现代通讯打下了基础。英国取得的成就甚多，而这项成就却是在英国政府以及当年一些地位最高的科学家持反对